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李贽

LI ZHI

张献忠◎著

大家精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李贽

张献忠◎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贽 / 张献忠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1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3541-3

I. 李… II. 张… III. 李贽(1527~1602)—传记
IV. B24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7201 号

出版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沈正德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李贽

LIZHI

张献忠◎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650034-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415-3541-3

定价: 16.80 元

目 录

引 言	001
第1章 颠沛流离的一生	005
一、乡试中举，仕宦生涯	005
二、辞官弃家，耿李论战	027
三、隐居龙湖，潜心著述	035
四、颠沛流离，笔耕不辍	040
五、通州被逮，荣死诏狱	044
第2章 哲学和社会思想	046
一、李贽对儒家思想的批判	046
二、李贽的哲学思想	051
三、李贽的社会思想	061
第3章 政治经济思想	072
一、李贽的政治思想	072



001



002

二、李贽的经济思想	080
第4章 文学思想	085
一、文学的创作源泉和表现方法	085
二、对通俗文学的肯定	090
三、文学的功能	093
四、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	095
第5章 史学思想	099
一、李贽的进步史观	099
二、《藏书》所反映的史学思想	105
第6章 影响及其地位	120
一、李贽思想在明代的传播及其影响	120
二、李贽思想在清代的影响及其命运	126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李贽思想的传播	132
四、李贽思想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	138
附	
年谱	149
主要著作	152

· 引 言

万历三十年（1602）5月6日，在京城一座关押朝廷钦犯的监狱里，一位胡须花白、面容憔悴的老者利用狱卒为他理发的时机，夺过剃头刀，直刺自己的咽喉，顿时，血流遍地。狱卒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写道：“不痛。”狱卒又问：“你为什么自杀呢？”他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次日子夜，这位老者与世长辞，享年76岁。

这位老者就是公然提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并敢于“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明朝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是明末杰出的思想家。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的一个航海世家，到他父辈时家道已经衰落。也许是因为海洋文化的浸润，养成了他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和叛逆精神，李贽从小喜欢独立思考，绝不迷信任何权威，不盲从任何学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正是这种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16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李贽生活的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纯粹商业和手工业性质的城镇。这些新兴的城镇与明中后期前传统的城市不同：传统的城市主要是政治性的，居民以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为主；而新兴的城镇则是商业性的，是以经济和消费为中心，居民也以普通的市民阶层为主。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物质生活的丰富，社会上奢侈享乐、越礼逾制之风也因此愈演愈烈。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急剧膨胀，出现了“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局面；另一方面，受封建伦理道德影响最深的封建官僚阶层自身呈现出严重的人格分裂，虽然他们开口闭口仍是大讲封建伦理道德，而实际行动上却与封建伦理道德的“重义轻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追求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相违背。很多官员为了攫取财富，利用自身特权参与了商业活动，甚至出现了“官与贾无别矣，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的局面。商品经济的冲击，统治阶层自身对道德的践踏与背叛，使儒家的正统思想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中国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到了程朱理学时期，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主张，对“人欲”大加挞伐，作为欲望主体的“自我”因此被扼杀，儒家学说日趋僵化。提倡禁欲主义的程朱理学，被作为明代的官方统治思想严格确定下来。但是这种以束缚人性、压制人欲为特征的道德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一是相对贫乏的物质生活，二是专制政权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厉控制。而明中后期的社会思潮恰恰面临着这样一个难得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丰富；当时

的明廷，由于皇帝的长期怠政，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党争，朝臣间的彼此倾轧，国家机器陷入半瘫痪状态，失去了运转的有效性。再加上阉党专权，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东北女真族的侵扰，内忧外患，使其无暇过多顾及思想领域的问题，这为思想的活跃提供了难得的历史际遇。

明中后期的皇帝大都比较有个性，而且长期不理朝政，这一点在其他朝代是很少见的。如嘉靖帝崇奉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整日幽居深宫，与方士一起炼丹，曾20年不见朝臣。万历皇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10岁登基，在位48年，是明朝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实际掌权35年，其中有25年是闷在深宫，不见朝臣，不批奏章，长期怠政，以致造成了“官曹空虚”，很多部门长官或其他主要官员退了休而不补缺。到万历三十六年，仅中央六部尚书编制6人、侍郎编制12人中，就缺尚书3人、侍郎10人，全国行政机构几乎陷入瘫痪。明熹宗也是个非常有个性的皇帝，作为堂堂的一国之君，他不仅不理朝政，还经常躲在深宫里干他钟爱的木匠活。皇帝的怠政虽然加剧了政治的腐败，但客观上却使专制统治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应该说，明中后期思想的活跃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兴起与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

程朱理学的日趋僵化和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外在的“天理”对社会失去了约束力。为挽救传统道德所面临的危机，王守仁（因早年筑室阳明洞中，故学者称其为“阳明先生”）创立了“良知学”，亦称“阳明心学”，企图重建封建道德的权威。他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物”、“求理于吾心”等命题，试图把传统的道德规范从外在权威转而内化成人的自

然情感，其最终目的仍不外乎是“灭人欲，存天理”。但它把心提高到本体地位，从而在客观上突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使整个社会思潮转向了“内醒”，转向了对尘世中人的内心的关注，使两千年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出现了裂缝。其后王学不断发展，到了王守仁的学生王艮形成了“泰州学派”，已“非复名教所能羁络”，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认为解决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问题才是真理。李贽正是循着这一裂缝，欲把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专制制度掀个天翻地覆。



第 1 章

颠沛流离的一生

李贽
LIZHI

005

一、乡试中举，仕宦生涯

李贽6岁时丧母，父亲以教书勉强维持生计。7岁时，李贽开始跟随父亲读书，12岁的时候，写了篇习作《老农老圃论》。在这篇文章中，李贽把《论语·子路》中“樊迟问稼”和《论语·微子》中“子路遇荷蓑丈人”两段内容结合起来，讽刺了鄙视农业劳动的孔子，赞扬了关心农事的樊迟。为同学们所钦佩和赞叹。“樊迟问稼”的原文如下：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老农老圃论》主要是针对这段话而写的，这篇文章的大体内容是：樊迟问孔子如何种庄稼和蔬菜，而孔子在背后骂樊迟是

小人，是因为樊迟明知孔子对农业一窍不通，还要提问，在孔子看来，这就如荷蓀丈人嘲讽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般，因此孔子不能容忍，故骂樊迟为“小人”。

在封建社会，孔子是读书人顶礼膜拜的“圣人”，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在传统的教育中，对于“樊迟问稼”都遵循孔子的“圣训”，批评樊迟，认为耕地种菜不是读书人该做的事，当然樊迟也就不该提问。然而，李贽从小就喜欢独立思考，绝不遵从任何权威，他的这篇文章就充分显示了他的叛逆精神，是他“异端”思想的萌芽。

作为长子，李贽理应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无奈明代科举考试规定只能从四书、五经中出题，而且作文只需依照朱熹的传注“代圣贤立言”，这就剥夺读书人独立思考的权力，对于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李贽来说，这简直就是活受罪。他越是读书，越是思考，就越觉得朱熹的话漏洞百出，甚至是一派胡言，他简直就想把四书、五经付之一炬。但是，家庭的重负不允许他意气用事。

20岁时，李贽和黄氏结婚。这时候，父亲已经年纪大了，身体日趋衰弱，弟兄姊妹八个人，也大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成家后的李贽自然应当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婚后不久，李贽就不得不为了生活四处奔波。他曾在给好友焦竑的一封信中说：“弟自弱冠（古代男子年至二十，便要在宗庙中行加冠的礼数，表示已经是成年人了，但体犹未壮，故称“弱冠”）糊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

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庭，李贽也要在举业上一搏。于是他想出了一条捷径，就是反复揣摩当时的八股文文

风，选择那些词句尖新的八股文范文，“日诵数篇”。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贽参加了福建乡试，这时，他已经背熟了五百余篇八股文。考试时，李贽将这些烂熟于胸的八股文移花接木，连缀成文，结果顺利过关，成为举人。这年他26岁。

在明代，乡试中举后就获得了做官的资格。但到明代中叶之后，举人出任的官不仅职低权轻，一般都是县学“教谕”（从九品），而且还要等到有了“官缺”后才能有机会替补，甚至还不能保证个个都有官做。因为这时举人数量日趋增加，而官位就那么多，僧多粥少，分配不过来。

不过，举人即使不当官，仍属乡绅之列，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在民间享有极高的权威，是“一邑之望”、“四民之首”。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乡绅势力极盛，其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兼并田产，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为地方上相当普遍的现象。清人顾公燮所著的《消夏闲记摘抄》中说，明朝士子一旦中举，报信的人大都拿着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则紧随其后，“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接着，“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求得庇护。举人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李贽之所以参加科举考试，看重的不是这些，而是为了养家糊口。由于对程朱理学深恶痛绝，李贽决定不再参加会试，想在离家近的地方谋得一官半职，以便照顾家庭。嘉靖三十四年（1555），李贽的长子病死。在苦苦候补三年后，李贽被任命为河南辉县教谕。然而李贽非但没有任何欣喜之情，反而顿生忧虑，特别是年迈的父亲，更是他心中的牵挂。后

来，李贽在回忆起他接到任命书的心情时说：“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即辉县）万里，反遗父忧。”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如今又要离开父亲和妻子儿女，远赴数千里之外的偏僻小邑，李贽因此忧心忡忡。但转念一想，辉县虽然偏远，可那是北宋大学问家李之才做官的地方，而且易学大家邵雍曾不远千里从洛阳前往辉县向李之才求学问道，并长期隐居于此。在邵雍的精神感召下，李贽变得超然起来，决定效仿邵雍，“苦志参学”，以求闻道。为此，李贽到达辉县后，在县城西北百门山建舍安家。这里环境清静优雅，遍山清泉，又名百泉门，李贽因此自谓“百泉人”，又号“百泉居士”。这里也是昔日邵雍居住的地方。遗憾的是，当时的辉县已经没有李之才、邵雍之辈了，更何况李贽也不是邵雍：邵雍无经济之忧，无家室之累，可以潜心求道，而李贽则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数千里之外的父亲和妻儿更是他心中的牵挂。他的思想和“自幼倔强难化”的性格也使他与上司合不来，正如他所说的“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实际上李贽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学道，结果在辉县做了五年的学官，“落落竟不闻道”。

嘉靖三十九年（1560），李贽被选调南京国子监任教。南京是文人荟萃之地，而且离家也近了，这下，李贽可以求学问道了，也方便照顾家人，他还曾想将父亲接到身边以尽孝道。然而，上任仅两三个月，就传来了父亲病逝的噩耗，李贽匆匆南下回家奔丧。明代规定，官吏在父母或祖父母去世后，必须回乡守孝三年。三年后，李贽又要到礼部报到，等待重新安排官职。或许是儿子和父亲先后离世对李贽打击太大，他不忍再

抛妻别子，于是带着家眷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李贽又等了十一个多月，才得到了北京国子监博士的职位。这期间，李贽的积蓄都花光了，只得以给人做家庭教师维持生计。刚就职没几天，灾祸又一次降临到李贽的头上，他的祖父和次子先后去世，李贽只得把妻女安置在河南辉县后再次回老家奔丧。当年，河南辉县发生了灾荒。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为祖父守孝三年后，李贽回河南辉县去接妻女。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回家守孝几个月后，二女儿和三女儿相继饿死；若不是李贽的好友邓石阳解囊相助，或许妻子和大女儿也已经不在人世了。相聚的那一夜，夫妻秉烛相向，欲哭无泪。

几年内，五位亲人相继离开人世，李贽精神上遭受了沉重打击，特别是两个女儿竟然被活活饿死，更是深深触动了他的思想。他本来就厌恶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道学先生，经历了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后，李贽对“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空洞说教更是深恶痛绝。亲人的死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并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之情，由此促使他思考生死问题。这既是求学问道的原动力，也是他求学问道的最终目的。李贽深深地认识到：穿衣吃饭、百姓日用这些人类的自然欲求才是“天理”，才是世间最大的“道”。

李贽回到河南之后，很快就病倒了。时值盛夏，李贽决定搬到白云山的白云寺居住，一是为了养病避暑，但更重要的是借山水排解心中的悲苦。在白云山的这段日子里，好友邓石阳经常来看他，其他好友如赵永亨、陈荇、张士允、张世乐、傅坤、王明斋等也经常光顾白云寺，他们或切磋棋艺，或对酒赋

诗，或纵情论道，或寄情山水。李贽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超脱。十余年来，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庭，李贽奔走南北，如今父祖先后故去，兄弟姊妹也已经成家，自己也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是应该为自己活了。这时，李贽已萌生了归隐的想法。下面的两首诗颇能反映李贽当时的心境。

相访过山寺，题诗欲满山。野人惊瘦病，仙客喜开颜。落笔天将暮，举头叶可攀。行吟出树下，云在意俱闲。

世事何纷纷，教予不欲闻。出郊聊纵目，双塔在孤云。雨过山头见，天晴日未曛。骑驴觅短策，对酒好论文。

在这两首诗里，没有尘世的纷扰，没有官场的应酬，有的只是山寺、高耸云间的双塔、举头可攀的绿叶以及二三同好对酒论文、寄情山水的惬意，俨然一幅归隐图。

但是，李贽还不能归隐，因为他还得“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做了几年的教官，李贽一点经济基础都没有。本来从九品的教谕俸禄就极其微薄，他又不像其他官吏，虽官俸低但贪污受贿所得颇丰，加之多次往返于河南、泉州以及北京之间，为父祖操办丧事，李贽不仅一点积蓄都没有，还要靠朋友接济。更何况，李贽还要求道，为此要求“胜己之友”，而河南辉县这个地方没有大学问家。

这年秋天，李贽在接到吏部的通知后，携妻女前往北京出任礼部司务（从九品）。礼部司务负责该部的杂务，是一个地位低收入少的穷差事。当时就有人劝他辞官，有了好的官缺再去上任。然而，李贽有自己的想法。他虽然还得“假升斗之禄

以为养”，但与前些年相比，家庭的负担轻了。前些年是为家庭、为生活而奔波，无暇求道，而现在他志在求道。因此，李贽说：“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李贽所看重的不是官职的大小和财富的多寡，而是看重京城的人文环境，看重访学问道。李贽认为，最大的贫穷乃是不闻道，不闻道则无见识和骨力，“无见识则是非莫晓，贤否不分，黑漆漆之人耳，欲往何适，大类贫儿，非贫而何？无骨力则待人而行，倚势乃立，东西恃赖耳，依门傍户，真同仆妾，非贱而何？”

李贽对贫富贵贱的认识还体现在他当时所作的《富莫富于常知足》一诗中：

富莫富于常知足，贵莫贵于能脱俗；贫莫贫于无
见识，贱莫贱于无骨力。

身无一贤曰穷，朋来四方曰达；百岁荣华曰夭，
万世永赖曰寿。

见识和骨力，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一种不依傍于他人的独立的人格。此前，虽然李贽也一直在追求自我，但是其前半生基本上被束缚于儒家伦理的锁链之中：遵循儒家礼教，他为父亲守孝三年，又为祖父守孝三年，不得不为此而几度南北奔波；遵循儒家伦理，他为弟弟娶了媳妇，为妹妹办了嫁妆，使他们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为了在传统的伦理关系中扮演一个尽伦尽职的角色，他不得不奔竞于官场，谋一官半职，以便有能力承担起对家族的义务。尽管对弟妹尽为兄的责任是合理的，但儒家伦理、官场氛围实在是太压抑人了，使得他的前

半生几乎丧失了自我。

任礼部司务的五年，李贽结交了很多知名的学者，这一时期是他学道的入门阶段。当时，阳明之学风行海内，弟子遍天下，讲学之风盛行。北京尤其如此。内阁首辅徐阶就是阳明学的信徒，他也是讲学的大力提倡者。李贽上任后，很快就与同在礼部任职的李逢阳、徐用检成为朋友。李、徐二人都是阳明学的信徒，他们二人常随赵大洲讲学。赵大洲是泰州学派王良的再传弟子，嘉靖、隆庆年间官翰林，与四方豪杰讲习，撻伐俗学，发明本心，以天下为己任。一日，徐用检又去从赵大洲讲学，约李贽一起去，起初李贽不肯去，徐用检乃“以手书《金刚经》示之曰：‘此不死学问也，公亦不讲乎？’（李）贽始折节向学。”李逢阳、徐用检还经常向李贽讲王守仁和其学生王畿的思想，引导李贽读他们的著作。

王守仁曾将自己的学说概括为“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实际上是借用禅宗的修行方式去“致良知”。王畿进而提倡四无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无须去“格物”，更加强调了心性，禅学色彩亦更加浓厚，这一点对李贽的影响很大。

这一时期，经李逢阳介绍，李贽还结识了王守仁的再传弟子李材，后来他在《答李见罗先生书》中说：“昔在京师时，多承诸公接引，而承先生接引尤勤、蒙启蔽，时或未省，而退实沉思。既久，稍通解耳。师友深恩，永矢不忘。”在北京的五年，李贽潜心王学，吸收了王学中的积极思想。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